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论纲

李维武 何 萍

一、时代提出的课题

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是现时代向我们提出的重要理论课题。

文化问题是20世纪哲学的核心问题。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人类历史的急剧变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把人的存在、人的价值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人的存在、人的价值问题归根结蒂是人的文化问题。哲学家们思考人的存在、人的价值,实质上是在探求人的文化发展的道路与希望。这种思考与探求,与其说是对人的前景的忧虑,不如说是人对自身更深沉的反思。它标志着人类已经由近代对理性的盲目自信转向了对理性的实际批判和真正思考,标志着人类对自身的认识经过漫长、艰难、曲折的发展而上升到一个新水平。哲学发展由近代理性主义转变为现代文化问题探索,从研究的问题到思维的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展示了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现代哲学形态。正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能回避文化问题,而必须在总结、概括、提炼20世纪人类思维特点及哲学研究全部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文化问题,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

文化问题也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早在19世纪末,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寻找中国近代化道路,就开始对文化问题进行哲学思考。自五四时期以来,中国现代哲学的三大思潮——强调科学意义和科学方法的科学主义思潮,反对科学万能论、重视人文哲学和传统文化的反科学主义思潮(亦可称为人文主义思潮),高举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旗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环绕文化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取得了胜利,成为代表中华民族新觉醒的时代精神。今天,随着中国改革事业的深入,中国哲学界在经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之后,又展开了文化问题讨论。但是,这次文化问题讨论与以往的文化问题论争有着根本的不同:不是选择某种西方哲学思潮作为中国新文化的精神支柱,而是在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基础上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重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新哲学。因此,当前的文化问题讨论不是单纯地剖析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现象,而是从文化本体的高度说明人的主体性。这标志着中华民族已在理性的批判中觉醒。这也就逻辑地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理论课题。

本文立足于人类现代思维的高度,通过清理、借鉴西方与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成果,以阐发主体性为轴心,展开我们对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基本构想。

二、主体性：文化与实践

文化哲学所探索的主题，实际上是人的主体性问题。同以往的一般哲学人学相比，文化哲学是思想更深刻、内容更丰富的哲学人学。^①通过对文化的最一般性质和特征的考察，更深刻地揭示人的主体性，是文化哲学的特点。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是共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又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强调从文化与实践的联系上探讨人的主体性。

马克思创立的实践理论，提出了在新的思维基础上确立人的主体性论纲。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对于人的主体性，不能象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那样，“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也不能象黑格尔等唯心主义者那样，“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而“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唯一正确的思路，只能从“实践去理解”。“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只有人的实践的力量，才能证明人的主体性。^②马克思的这些思想，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③。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并没有被充分展开和深入探讨，更没有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新世界观的起点和基石，以致在时下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实践”概念被降为认识论范畴，甚至等同于吃梨、吃西瓜。这种对“实践”理解的简单化、贫乏化、庸俗化倾向，不可能正确说明人的主体性，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怎样改变这一状况呢？我们认为，只有把实践同文化联系起来，才能深刻地、本质地揭示人类实践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进而丰富和深化马克思所确立的人的主体性论纲。

所谓文化，并不只是人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汇，而是人的自我创造性、人的生命活动的体现。文化显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动态联系，说明了人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中创造世界、同时也创造自己的。因此，文化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离开文化来谈自我创造性、来谈人的主体性，必然跳不出主观性的圈子，因而无法说明主体与客体的联系与统一。近代的理性主义与当代的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在说明人的主体性时实际上都看到了人的自我创造性，但它们又都把人的自我创造性归结为人的主观性的某一层面，不能真正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巨大对立。

近代的理性主义用理性说明人的自我创造性，说明人的主体性。这条理性主义路线在19世纪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黑格尔在他的空前庞大的思辨哲学体系中，系统地描述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创造力量，证明了“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则是能思维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④。理性主义对于从中世纪神学统治下重新发现人的价值、肯定人的主体性，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但是，理性主义倡导的理性，只是抽象地展示了人的生命活动，只是一种抽象的自我创造性，并不能真实地说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动态联系，现实地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这就决定了理性主义不可能完成确立人的主体性的任务。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受到了普遍的摒弃，出现了实证主义思潮和非理性主义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强调经验是知识的来源和有效范围，主张一切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非理性主义思潮强调非理性化的主观意志、

本能欲望、生命冲动的能动作用和创造作用，认为整个现实世界都是其创造物。这两大思潮都力图摒弃抽象的思辨的理性，而对人的生命活动、人的自我创造性作出新的说明。但是，它们同近代理性主义一样，仍在人的主观性范围内兜圈子，仍把人的自我创造性归结为人的主观性的某一层面，因而都不可能正确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确立人的主体性。

在这方面，文化哲学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文化哲学从文化出发说明人的问题，最主要之点就在于用文化揭示人的自我创造性，把人的自我创造性看作是劳作与活动，即人类文化。在文化哲学看来，人类正是通过自己的活动、劳作，创造了文化的宇宙，把自己同自然界联系、沟通起来。从神话到科学，整个文化的宇宙，都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和人对自然的改造。随着文化的发展，人类社会日益完善，人类力量日益发挥。文化哲学从文化入手确立主体性的新思路，为解决主体与客体的联系与统一开辟了道路。这是文化哲学比之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更深刻、更有价值的思想，推进了对人的主体性的探索。

但是，文化哲学也有其理论局限。不少文化哲学家一方面强调人的自我创造性是活动、劳作，另一方面又把人的自我创造性看作是先验的精神。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可能真正科学地说明自我创造性，揭示活动、劳作、创造性的实践意义，完成确立人的主体性的任务。要克服文化哲学的理论局限，只有用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去改造文化哲学中的那些合理思想，使文化与实践联系起来，把文化理解为人类实践的体现。我们认为，实践与文化是不可割裂的。只有从实践上理解文化，才能真正把握文化的实质；只有通过文化来看实践，才能深刻地揭示实践的内涵与意义。

从文化看实践，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实践不是吃梨、吃西瓜之类的杂乱肤浅的日常琐事，而是包括了文化宇宙的全部创造过程。人类正是通过创造文化，与自然界交往，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并使自己与自然统一起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也不断完善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形成了日益复杂的社会联合体。同时，人类的自我创造性又总是受着该时代、该民族文化的制约，文化传统决定了人们创造活动的特点。总之，体现为一定文化的实践，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联系的历史尺度。只有了解了实践的这种丰富内涵和巨大历史感，才能正确说明人的主体性。

三、文化的结构与功能

人的主体性通过文化体现出来，具体地表现在文化的结构和功能上。

任何文化都不是文化产品或文化现象的简单堆砌，而是文化要素的有机整合。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文化“是一套大体一贯的思想及行为模式”^⑤，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主导观念，将各种分散的文化元素整合起来，具有整体的意义和价值。这就形成了文化的结构，亦即文化的模式。文化的结构包括两个最基本的层面。一是观念的结构，一是物化的结构。物化的结构是文化模式的外显的、浮动的、易变的内容，其中又可分为科学、工艺、技术等物化形式层面与经济、政治关系层面。这是人的主体性的外部结构。观念的结构是文化模式的深层的、凝重的、稳固的内容，包括价值观念、智力结构和行为方式，其中又可分为决定时代精神的层面与决定民族精神的层面。前者是物化结构发展的反映，决定着同一定物化结构相应的哲学、宗教、道德情操、精神风貌等意识形态和社会心态；后者则是这些意识形态和社会心态在漫长历史岁月演变中的积淀层，决定着一种文化模式的特殊性。这是人的主体性的内部结

构。文化结构的这些层面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同时又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任何观念结构都要通过一定的物化结构体现出来，而任何物化结构又总是体现了一定的观念结构。观念结构的状况制约着物化结构的变化，而物化结构的变化又必然促进观念结构的改变。同时，一种文化模式在与它种文化模式发生接触、进行交往时，彼此各层面之间又必然发生冲突与融合、排斥与吸取等复杂关系，促使其中某些层面乃至整个文化模式发生重大变动。文化结构的整合机制，首先从这些层面的关系中显露出来。

值得指出的是，文化结构诸层面的变化是不同的。物化结构的变化一般是较快的，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大部或全部更新。其中，物化形式层面的发展要比经济、政治关系层面的变化要快得多。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更是如此。观念结构的变化则是比较缓慢的，难以象物化结构那样较快更新。其中，决定时代精神的层面，随着物化结构的改变，或迟或早要发生变化；而决定民族精神的层面，则往往表现出巨大的传统惰性力，并不随着其他层面的变化而立即改变，只有通过物化结构和时代精神层面的几度变迁或强烈冲击，才能逐渐变化，并且不可能完全更新。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一个民族可以吸取异域的文学艺术，可以发展现代的科学技术，可以建立新型的经济、政治关系，可以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心态上发生重大变化，可以在一百年、甚至几十年内走完近代化的历程，但却仍保留着本民族古老的文化传统，在现代文明上深深烙上本民族文化的印记。

文化要素的整合、文化结构诸层面的变化，产生了文化的功能。正是这样，人通过文化创造，同自然界交往，也同他人交往。文化功能的发挥，是人类展示主体性的过程。

文化的功能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文化功能的发挥是人的主体性从潜能到现实的生生不息的运动。人类文化发展的总特点，就是不断地由主观见之客观、使主体指向客体，从而使文化宇宙日益丰富复杂，将人的理想逐渐地实现，将人的主体性逐渐地显现。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原始人类刚刚从自然界分离出来，文化极为简单，除了运用十分简陋的生产工具战天斗地外，只有运用宗教与神话同自然界交往，通过宗教乞求自然界的恩赐，通过神话表达改造自然的理想。而在科学、工业飞速发展的今天，人类则已创造了巨大有力的文化宇宙，更多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通过极其复杂的经济政治关系同自然界交往，把人类世代的理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其次，文化功能的发挥实质上是文化的不断创造。这种创造不是割裂文化的传统，抛弃以往的成就，而是对以往的或外来的文化要素加以新的改造、阐释、发挥，对其意义作出新的规定。人们总是以先辈的文化创造为自己创造活动的出发点，又为后继者准备创造的前提。这就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是批判与继承、创新与续旧的矛盾运动。

再次，通过文化功能的发挥，人类逐渐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逐渐地把自然界转化为对象世界，把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在与自然界的联系上，人与动物有本质的不同。动物与自然界的联系是直接的、无中介物作用的。人与自然界的联系则是间接的、以文化为中介而实现的。人正是通过扩大文化而扩大与自然界的联系。文化发展到今天，人与自然的联系已由古代的狭隘的区域性联系扩展为全球范围、乃至与地球之外的自然界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迫使今天的人类必须认真地对待人口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能源问题、发展问题等一系列全球问题，重新思考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应当自觉地调节文化的结构与功能，使人的发展同自然的发展协调起来。

最后，文化功能的发展，也改变了人与社会的关系。远古的人类生产力极为低下，只有发挥群体的力量才能同自然界抗争，因而建立并发展了社会联系和社会组织，以调整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人依靠社会力去改造自然,使自己得以生存和发展。社会发展保证了人的发展。但是,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特别是近现代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使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性逐渐暴露出来。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冲破了一切落后民族闭关自守的大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联系日益紧密;另一方面,人又完全为社会所控制,受到经济危机、军备竞赛和核战争的威胁,受到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虽然消除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但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人们为了控制社会,调节人与社会的关系,必须对文化的结构与功能进行调节。在这里,有一个整体性问题:这种调节不仅是变动经济、政治关系,而是文化诸层面的总体改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调节人与社会的关系,保证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致性。

文化功能的以上特点,包括了四对矛盾:潜能与现实、革新与继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它们是相互联系的,构成了统一的文化功能,展示出人的主体性。

四、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不仅要探讨文化的结构与功能,而且要研究文化发展的规律。文化发展规律的最主要问题,是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人类文化是遵循普遍的规律发展,还是按照各民族的特殊方式发展?二者之间有没有统一性?

西方文化哲学研究文化发展规律经过了从文化进化论到文化相对主义的历程。19世纪中叶,泰勒率先运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模式考察文化发展的规律,揭示了文化发展的普遍性。泰勒认为,不同民族的文化发展都必然依次经过野蛮、蒙昧和文明生活几个阶段。泰勒把文化发展看作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由野蛮而文明的进化过程,揭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肯定了人类历史活动有其普遍规律;但他又把文化发展看作是单线进化,把不同民族的文化按其经济发展的状况有秩序地排列在同一阶梯上,而以西方文化位于人类文明的最高点,作为文化发展的最高成就,以此评判非西方文化的优劣高下,这就把历史发展规律绝对化,泯灭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形成了19世纪文化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世界历史的变迁,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不同民族文化的共时性存在。这时,韦伯、斯宾格勒、汤因比、本尼迪克特等一批文化哲学家主张运用历史研究方法考察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形成了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同文化进化论相比,有其高明之处:它从肯定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出发,分析各种文化结构的特殊性,揭示它们产生、发展的内在原因与特殊规律,从而展示了人类文化的丰富内容,否定了文化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这在思想方法上是一个大飞跃,为人类认识自己的历史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但是,文化相对主义由于过分强调各种文化的差别性,而否定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不到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向上前进的总过程,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因而也未能对文化的发展作出科学的说明。

我们认为,文化的物化结构与文化的观念结构是辩证地联结在一起的,这决定了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在联系。各民族的文化在发生接触、进行交往时,首先在文化的物化结构层面相互融合、吸取,然后逐渐向文化的观念结构渗透,推动着文化模式的演化,使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一种不断向上的总趋势。但是,文化模式中的决定民族精神的层面具有巨大的惰性力,对文化的其他几个层面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制约着整个文化结构的变化,在文

化发展上深深烙上本民族文化的印记,决定着各民族文化新发展的历史起点,使各民族文化在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速度、发展前途上各有特点。这些就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性。文化的物化结构与文化的观念结构之间的变化关系决定着世界文化发展的普遍性,又决定着世界文化发展的普遍性必然通过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得到表现和实现。

由以上分析,研究文化发展规律,探索各民族的文化发展道路,必须立足于文化历史层面,从文化整体模式、从文化模式中的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出发,而不能单纯以某一种因素(或经济、或政治、或道德)来说明。为了更深入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有关人类进步问题。

五、文化发展与人类进步

文化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动态联系,因此,文化发展与人类进步是密切相联的,人类进步的实质就是文化发展。只有从文化发展入手,才能真正解决人类进步问题。

首先,人类进步是通过文化发展实现的。人类进步即人的不断解放和主体性的不断发挥。主体性的发挥,不仅是物化形式的更新,也不仅是经济、政治关系的变革,而是包括物化结构和观念结构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发展。它是通过解决文化功能的四对矛盾——潜能与现实、革新与继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而实现的。只有解决好这四对矛盾,才能真正把人的主体性发挥出来,才能真正解决人类进步问题。如果只把人类进步归结为文化某一层面、某一要素的发展,就必然会陷入片面性,而不能真正揭示人类进步问题。

其次,人类进步是以文化发展为尺度的。由于文化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联系的历史尺度,人类进步是通过文化发展实现的,因此,文化发展必然成为人类进步的尺度。这就是说,衡量人类进步的真正标准,不是文化某一层面的发展,而是整个文化的发展。在评判人类进步的程度与速度时,不能只抓住文化的某一层面、某些要素来做标准,而应从人类对文化功能的四对矛盾解决的程度、方式上来评价。

正是这样,任何抛开文化发展而探讨人类进步问题,都不可能对人类进步的实质和标准作出合理的说明。

人们曾用人的生物性说明人类进步,认为人的发展同动物一样,是生命机体的进化。达尔文从物种进化的角度探讨了人的生命起源和发展。以后,人类学、考古学又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从自然人的角度考察了人类进步问题。然而,不管这些研究多么丰富,都难以说明这一历史事实: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数千年间,特别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短短数百年间,人类的生命机体并未发生重大变化,而人类却取得了空前的进步。因此,用人的生物性不可能说明人类进步。

人们还习惯用人的理性说明人类进步。兴盛于资本主义凯歌行进时代的近代理性主义,把人类进步看作是理性的高扬,强调“知识就是力量”,认为理性、知识、科学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黑格尔哲学典型地展示了理性主义人类进化观,把人类进步描绘为理性精神的发展过程。理性主义看到了知识、科学发展在反对中世纪神权统治、蒙昧主义斗争中的重要启蒙意义和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从理性人的角度考察了人类进步问题。但是,理性主义不可能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复杂性。随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逐渐暴露,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理性原则受到了普遍怀疑。一些思想家提出:“‘进步’这一概念究竟

在哪些范围内具有意义，有重新评价的必要。”用人的理性说明人类进步，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理论”。⑥

与以上两派观点不同，现代文化哲学提出人类进步的实质是文化进步，认为只有通过调节文化的结构与功能，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的正常的发挥，从而解决好潜能与现实、革新与继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才能保证人类获得进步。同近代理性主义相比，现代文化哲学从文化人的角度对人类进步问题的思考，更具有现实性和启发性，产生了深广的影响。近年来，联系文化发展来思考人类进步，已成为研究当代人类进步问题的新的思维模式。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处于转折点”的一系列报告，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关于“展望21世纪”的对话，美国社会学家关于新技术革命与后工业社会的预测，当代新儒家关于儒家资本主义的方案，都尖锐地提出了人类进步的关键在于文化问题，力图从文化发展入手，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困境。当然，现代文化哲学对人类进步的反思也有缺陷，往往过分强调文化的观念结构的作用，而忽视文化的物化结构，特别是科学、技术、工业的作用。这又陷入了新的片面性。

我们认为，只有看到文化的物化结构与文化的观念结构的辩证联结，从总体上把握文化，才能真正揭示文化发展对于人类进步的意义。人类只有既学会认识、利用自然，又学会改造、协调社会，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取得进步。

首先，人类进步既有赖于文化物化结构的更新，又需要进行文化观念结构的更新。物化形式层面在文化中是最活跃的因素，它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技术的革新、工业的发达，固然会成为整个文化发展的有力杠杆，但毕竟不是文化发展的全部内容，不能成为人类进步的唯一尺度。

其次，人类进步不是一个简单的财富积累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选择过程。所谓文化选择，就是对文化规范性的超越。人的主体性通过文化体现出来，这就使文化对主体性发挥具有规范性。文化对人的规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文化为主体性发展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另一方面，文化又使主体性发展受到前提与条件的制约。因此，人类为了从必然中获得自由，就必须超越文化的规范性，对自己的前途加以选择。这种文化选择，是以获得自由的程度、即实现主体的价值为标准的，而不是以简单的物质财富的多寡为尺度。

既然文化选择是一种价值选择，而选择的主体的价值观又不相同，那么文化选择就存在着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冲突，存在着选择的文化模式与既定的生产力的矛盾，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存在着种种偶然性。人类进步就是在文化选择的冲突、矛盾、差距中实现的，通过偶然性而展示出必然性。因此，人类进步决不是笔直行进的。它时而慢，时而快，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在艰难曲折中向前拓展。

目前，在我国哲学界，几乎没有人用生物进化的方式说明人类进步，但用科学进化的方式说明人类进步的观点却常见。这种观点无法说明人类历史发展中必然性与偶然性、必然与自由的关系，归根到底陷入历史宿命论。如果我们从文化发展出发考察人类进步，肯定人的文化选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就有可能揭示人类历史发展中必然性与偶然性、必然与自由的关系的奥秘。

注释：

① 参见何萍、李维武《论文化哲学对人的本质的探索》，《江海学刊》（文史哲版）1987年第6期；《文化哲学的历史与展望》，上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20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2页。

⑤ 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台湾远流图书公司，第60页。

⑥ 见《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第408—409页。